

# 蓦然回首后的物我相通

——白先勇短篇小说集《台北人》解析

郑轶彦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图书馆, 重庆 400067)

**摘要:**《台北人》是白先勇最具有代表性的象征主义小说集,是作者在台湾现实社会中寻找与自己内在精神存在物我相通的产物。从白先勇的现代派文学情结、来自台湾现实社会与心灵相契合的象征意象、以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弥补西方现代派文学创作缺陷等三个方面对《台北人》进行分析,有助于读者深刻理解其象征主义文学创作风格。

**关键词:**白先勇;台北人;象征主义;意象;人物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0)01-0062-04

白先勇是我国台湾地区20世纪60年代现代派小说创作的领军人物,曾被著名学者夏志清称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收录了其代表性作品,一直以来受到读者的喜爱和评论者的关注,其中不少作品已经成为华文文坛现代派文学的经典。本文拟从白先勇的“现代派”情结、来自台湾现实社会与心灵相契合的象征意象、以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弥补西方现代派文学创作缺陷等三个方面对《台北人》进行分析,以期对读者深切体认白先勇的象征主义文学创作风格有所裨益。

## 一、白先勇的现代派情结

白先勇1937年生于广西桂林,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他自幼熟悉社会上流阶层的生活,并随父母迁徙于重庆、南京、上海、香港、台湾等地。其父白崇禧从战功显赫的北伐功臣、抗日名将,成为“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的战犯,最终随蒋介石逃往台湾。到达台湾后,与蒋介石关系复杂的白崇禧被解除职务。特殊的家庭背景,使得白先勇近距离地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兴衰,深切感受到人世的沧桑变化。

起初,白先勇在台湾成功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成绩优异,后因对文学更感兴趣,弃理从文,转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受到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大

学期间,他与同学一起创办《现代文学》杂志,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刊载现代派文学作品,使得现代派文学渐成台湾文坛主流。大学毕业后,白先勇赴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致力于西洋文学的创作与研究。留美期间,家庭变故给他带来了莫大痛苦,精神遭受沉重打击。1962年冬,白先勇的母亲去世,他感到家崩塌了。“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sup>[1]211</sup>紧接着,曾经叱咤风云的父亲也离开人世,让他“月余间,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sup>[1]214</sup>。

白先勇在大西洋彼岸回首往事,深感现实的冷酷、前景的迷茫、生命的脆弱、人生的无常、人在命运前的无能为力,其内心异常悲愤、苦闷和彷徨,这正好暗合了西方现代文学产生的心理基础。从此,他对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及其相应的现代派文学创作技巧心领神会:“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室,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小说技巧不是‘雕虫小技’,而是表现伟大思想主题的基本工具”<sup>[1]213</sup>。

## 二、《台北人》:与心灵相契合的台湾现实社会中的对应物

国民党政权溃退台湾时,除从大陆掠走大量的黄金、文物之外,还裹挟了包括60万军人在内的

收稿日期:2019-09-17

作者简介:郑轶彦,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200 万人口,汇聚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许多精英。初到台湾,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准以部会名义在台湾修建办公大楼,妄想打回大陆,还都南京。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蒋介石不得不将“反攻大陆”的口号改为“建设台湾,反共复国”。来到台湾的大陆人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越来越不满,对在有生之年回故乡越来越绝望,无根的漂泊感形成了浓得化不开的乡愁。“拉开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大幕,并推动了这一思潮的发展”的象征主义文学流派,主张透过表象世界洞察本体,“变文学的再现方法为暗示象征”<sup>[2]318</sup>。白先勇正是运用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对当时台湾生活表象的分析、综合和感受,在现实社会中寻找与自己内在精神存在感应的对应物,进而在情感和理智的共同作用下创造出富有强烈暗示意味的意象,完成了象征主义小说集《台北人》的写作。

### (一) 金钱和情欲的象征——神秘的“万人迷”尹雪艳

白先勇将《永远的尹雪艳》放在《台北人》开篇的位置上,表明这篇象征主义小说在作家心里应是深刻内涵与创作技巧结合的上乘之作。细读文本,会发现白先勇在文中隐喻着无数在台大陆人悲剧表象背后带有普遍性的本体:对金钱和情欲的追逐,导致了许多人生悲剧的产生。尽管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但人性的贪婪却使人们趋之若鹜,无论男女老少都如飞蛾扑火般络绎不绝。

上海是旧中国的经济中心,十里洋场的繁华给童年的白先勇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候我才九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直到 1948 年的深秋离开。可是那一段童年,对我一生,却意义非凡”,“战后的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像只巨大无比的万花筒,随便转一下,花样百出”<sup>[1]53</sup>。白先勇根据自己的童年经验,选取上海著名的百乐门作为充满诱惑的资本主义社会名利场的象征场景。在这纸醉金迷、纵情享乐的场所里,小说主人公尹雪艳就是雪白银子和香艳情欲的化身。“这就是尹雪艳:在兆丰夜总会的舞厅里、在兰心剧院的过道上,以及在霞飞路上一栋栋侯门官府的客堂中,一身银白,歪靠在沙发椅上,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把场合中许多银行界的经理、协理、纱厂的老板及小开,以及一些新贵和他们的夫人们都拘到跟前来。”<sup>[3]6</sup>到了台北,虽然地点变了,但人们对金钱的追逐和享乐的思想没有变,尹雪艳的新公馆很快又成为她新朋旧友的欢聚场所。人们沉溺其中,角逐金钱,炫耀富贵,道德沦丧,情欲泛滥,上演着一幕幕永恒不变的人生悲剧。

白先勇利用自己对上流社会生活的了解,化腐朽为神奇,通过想象从色、声、形方面创造出了尹雪艳这一超现实的女子。“尹雪艳是有一身雪白的肌肤,细挑的身材,容长的脸蛋儿配着一副俏丽甜净的眉眼子”,“从来不爱搽胭脂抹粉”,“也不爱穿红戴绿”,从上海到台北总是“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即便是夏天,她也浑身上下一片银白。尹雪艳讲的是“苏州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帖”,动作从容轻盈,“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总之,她的“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作为金钱和情欲化身的尹雪艳不需要任何包装修饰就能迷住所有的人,人们纷纷拜倒在“她”的脚下。然而,客厅中吐着浓香的晚香玉已经在暗示着:尽管人们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但对金钱的崇拜和对情欲的角逐注定是一场危险的游戏,谁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果然,“富二代”为“她”官商勾结命归黄泉;金融界官僚为“她”抛家弃子,丢了官,破了产;新兴的实业巨子为“她”道德堕落,压迫工人而送了命;曾经为“她”牺牲了青春和美貌的太太们,人老珠黄时自然被更年轻漂亮的小姐取代,心灵空虚,以泪洗面。

白先勇怀着一颗悲悯的心,借尹雪艳之眼看着注定了悲剧命运的逐鹿者们,这一群群是或曾经是风流倜傥、呼风唤雨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宰割。因金钱和情欲而起的人生悲剧在历史的长河中没完没了地上演着,却鲜有人回头。为此,白先勇在这篇梦魇般寓言小说的第一段,无限感慨地写下了“尹雪艳总也不老”,“不管人事怎么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

### (二) 传统“忠义”精神的象征——竭诚竭节的将士和仆从

“忠”和“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儒家先贤曾子有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sup>[4]61</sup>孔子不但“主忠信”,还用“忠”界定君臣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sup>[4]56</sup>对于“义”,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sup>[4]61</sup>，“见义不为,无勇也”<sup>[4]52</sup>，“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sup>[4]78</sup>。孟子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sup>[4]99</sup>,指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sup>[4]203</sup>,并提出“舍生取义”。“忠义”,对中华民族性格影响深远,成为中国人做人的基本伦理道德标准。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精忠报国”的岳飞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无数英烈的忠义爱国精神被世人传颂至今。为人谋而不忠,见利忘义,是被传统中国人鄙

视、不齿的小人行径。然而,随着金钱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这一民族的优秀品德正在消失。白先勇敏锐地感受到了,并在来台的大陆将士和仆从中寻找这种美德,于是有了象征主义小说《思旧赋》和《国葬》。

《思旧赋》中,脸上已经爬满皱纹的罗伯娘,面对整条巷子中唯一的旧屋李公馆依旧忠心不改。偌大的公馆,只剩下这位来自大陆已经70多岁的白发老妇还在忙前忙后,照顾着老、少两代主人。“忠义”精神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已经死去,买来的丫头桂喜和李家养了20年的王副官的儿子小王勾搭着,将夫人的玉器盗窃一空后跑了。少爷到美国留学却患上了精神病,隐喻着反叛传统文化,一心想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年轻知识分子终因文化断裂而深陷彷徨、迷茫中。白先勇还进一步通过小说《冬夜》对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决裂的“五四运动”进行了深刻反思。曾为“五四运动”干将的余教授晚年发出了“现在‘赛先生’差点把我们的饭碗都抢跑了”的感叹。白先勇在该篇小说中借一个哈佛大学刚毕业的美国学生的论文《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从旁观者的角度指出:“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徨、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sup>[3]284</sup>随着暮气沉沉的天空下寒风把罗伯娘那一头蓬乱白发全都吹飞去,传统文化已经渐行渐远,折射出作者苍凉的心境和浓浓的文化乡愁。

《国葬》将这一主题推向了高潮。小说主人公秦义方是李浩然将军的老副官,在跟随李将军转战南北的几十年里,不离不弃,悉心照顾,并以此为自己的本分。尽管后来他自己也已白发苍苍,但依旧忠心耿耿,“夫人过世后这些年,冬天夜里,常常还是他爬起来,替他盖被上的。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他就不会出事了。他看得出他不舒服,他看得出他有病,他会守在他旁边”<sup>[3]303</sup>。“忠义”精神不但隐喻在了副官侍从身上,也隐喻在上下级关系中。李将军的三员猛将章健、叶辉和刘行奇也表现出同样的赤胆忠心。李将军的灵堂上,已是白须的隐居香港的章司令来祭吊了,病恹恹的住在荣民医院的叶副司令来祭吊了,甚至已经出家、万事皆空的刘行奇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也来祭吊了。李将军在内战中明知无力回天,曾对刘行奇说这也是

大势所趋,但还是奋力而战,从一而终。小说结尾,白先勇通过秦义方的意识流动,联想在抗战胜利还都南京时,李将军带着秦义方、章健、叶辉和刘行奇等手下,与国民党大批高级将领聚在一块儿到紫金山中山陵去谒陵,暗示着“忠义”精神在上一辈中国人那里已经融入共同的血脉之中,被作为传统中国人的处世原则,成为民族性格中的一部分。何以使人“忠”?子曰:“孝慈,则忠。”<sup>[4]51</sup>白先勇极力渲染李将军对部下关怀体恤、慈爱有加。他对跟随多年的秦副官情同师生而直呼其名,并因台南天气暖和,让老来患上哮喘病的秦副官住进荣民医院休养。北伐时刘行奇的后颈受了炮伤,他特地派秦副官去照顾他。从大陆撤退时,李将军跟章司令、叶副司令在甲板上等刘行奇和他的兵团足足等了三天,才不得不带着一脸憔悴下令开船。他对被俘一年后只身逃到台湾的刘行奇没有苛责,谈及十几万广东子弟的全军覆没,两泪长流,痛心不已。随着李将军的离世,秦义方、章健、叶辉的衰老和刘行奇的遁入空门,剩下的只是一些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的头光脸净的年轻侍从。李将军心脏病发,倒在地板上,眼前一个侍从都不在。在年轻一代身上,“忠义”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李将军的儿子从军校装病退学后跑到美国,回来后在灵堂里面对“忠义”精神化身的老随从秦副官的呼唤,却一脸漠然。随着拜金主义盛行的西洋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国葬”掉的不只是李将军,还包括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品德。

白先勇认为,“20世纪的中国人,心灵上总难免有一种文化的飘落感,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在这个世纪被连根拔起,伤得不轻。”<sup>[5]476</sup>无论是《梁父吟》中国国民党元老朴公的儿子,还是《冬夜》里“五四运动”干将余教授的儿子,都纷纷到国外留学,传统人文精神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国葬》实际上隐喻着作家对传统文化后继无人的忧郁和绝望。

### (三) 中国的象征意象——海市蜃楼般的“家”

祖国是人们的精神家园,这里不但包含着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也包含着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确认。然而,对于数以万计的在台大陆人来说,因为政治的原因,不得不远离故土,漂泊异乡,被迫成为“台湾人”。这种无法“归根”的无可奈何的痛苦,深深困扰着每一个渡过海峡来到台湾的大陆人。白先勇曾说:“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个具体的‘家’、一

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的想得厉害。”<sup>[6]385</sup>正因为如此,在《台北人》中,所有来自大陆的“渡海一代”都没有可能与台湾当地人结成真正的家,因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在大陆,他们的民族身份是“中国人”。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大班在花天酒地、恣意卖笑中度过近半生后,寻了一个60多岁有些秃顶、出手有点抠门、但有三四百万家当的台湾老板陈发荣嫁了。这个迟到的家对于40岁的金大班来说只是自己的衣食归宿,而不是精神上的家园。她的“家”已经和最美的青春年华一起留在了大陆,剩下的只有追忆。《岁除》中满口四川乡音的赖鸣升退役后,用所有的退役金迎娶了一个20多岁的山地女子。可过门才三天,新娘子就逃得鬼影子不见半个。从此,赖鸣升打消了在台湾成家的念头,每次都在应该回“家”团圆的除夕用金门高粱酒将自己灌醉。《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行伍出身的王雄只因正上六年级的小主人丽儿生得雪白浪圆,同他湖南湘阴乡下的老娘为他买来的十岁童养媳年龄相仿,一般白白胖胖,一般好吃贪玩,就甘愿付出自己如火红杜鹃花般的所有心血,忍受百般刁难。面对台湾下女喜妹的反复挑逗,他总是避得远远的。但随着丽儿的长大和疏离,他感到离自己的“家”越来越远。终于在打了喜妹后,精神崩溃的他跳海自杀了。《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在大陆家乡与从小一起长大的罗锦善家姑娘订过婚,便一心一意地等待着。直到被眼中只有钱的香港表哥骗得身无分文,他对“家”心如死灰后,才和一个洗衣的台湾婆生活在一起。结果,他却被台湾婆咬掉了大半个耳朵,只剩下一把骨头,最后因心脏麻痹而孤独地死去。

白先勇关注着来台的200万大陆人,特别是其中“保家卫国”的60万将士有“家”不能回的精神痛苦,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小说《梁父吟》中通过国民党元老朴公的孙子背诵著名的《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暗示着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生存困境,揭示出自古以来每次人类发动的大小战争实际上都是对人的精神进行残酷摧残的本质,人生也因此充满痛苦且变幻莫测。

### 三、以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弥补西方现代派文学创作缺陷

白先勇既具有西方现代派文学情结,又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虽然在课堂上念的是西洋文学,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

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我患了文化饥渴症。”<sup>[1]213</sup>白先勇将西方现代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创作成就,以及自身所独有的人生体验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这种探触人性深处与生活表象背后本体的独一无二的创作风格。

在《台北人》中,除尹雪艳这个具有玄思色彩的神秘意象以外,其他人物形象都来自台湾现实社会。白先勇曾说:“我想‘台北人’对我比较重要一点。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sup>[6]392</sup>因此,作家在小说中根据自己在上流社会生活的经验和因其父亲而对军队生活的了解,寻找与自己心灵相契合的人物,并发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创设出了富有强烈象征暗示意义的意象和场景。但在对人物、情节、环境的具体描述上,白先勇又力求真实客观,颇具《红楼梦》白描写实之风采。他充分运用以动作和对话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文学手法,物我相通地用“台北人”表达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精神创伤,以及强烈的文化危机感,体现出悲观绝望的现代派意识和虚无主义思想。

文学批评家卢卡奇认为,现代派作家“他们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既适合于这一个人,又适合于另一个人;他们竭力要凸现人物的主观世界而牺牲了客观的现实和环境因素,结果,这些人物的主观世界反而变得贫乏空虚,犹如艾略特所描写的‘空心人’”<sup>[7]41</sup>。白先勇身为现代派作家,却不拘泥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方法,运用中国传统文学的创作技巧弥补了现代派作家在人物、环境描写上存在的致命缺陷,这也是继鲁迅《狂人日记》以现实主义写人物、以象征主义表寓意后的进一步拓展。这或许就是白先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

#### 参考文献:

- [1]白先勇.昔我往矣[M].北京:龙门书局出版社,2012.
- [2]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M].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3]白先勇.台北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4]于全主编.四书五经[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
- [5]白先勇.白先勇集[M].刘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 [6]白先勇.树犹如此[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7]盛宁.现代主义·现代派·现代话语——对“现代主义”的再审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于湘]